

知识的命运·论丛
The Fate of Knowledge

Science,
Existence
and
Politics

科学、
存在
与
政治

孟 强 著

科学与民主是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当代，它们却呈现出不容回避的张力。
本书主张，
真理、存在与政治是同一个问题，
科学民主化是科学赢得政治合法性的有效途径。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知识的命运·论丛
The Fate of Knowledge

Science,
Existence
and
Politics

科学、
存在
与
政治

孟 强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学、存在与政治 / 孟强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3
(知识的命运文丛)
ISBN 978-7-308-17345-2

I. ①科… II. ①孟… III. ①科学哲学—研究 IV.
①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16181 号

科学、存在与政治

孟 强 著

丛书策划 陈佩钰 吴伟伟

责任编辑 陈佩钰(yukin_chen@zju.edu.cn)

责任校对 杨利军 孙 鹂

封面设计 程 晨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0 千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345-2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知识的命运”编委会

丛书主编

盛晓明

丛书编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素梅（上海社会科学院）

丛杭青（浙江大学）

李恒威（浙江大学）

刘晓力（中国人民大学）

盛晓明（浙江大学）

吴国盛（清华大学）

吴 彤（清华大学）

张 立（浙江大学）

张志林（复旦大学）

总 序

“知识的命运”系列丛书今年终于能与读者见面了。这套丛书由论著和译著两个系列构成,主要涉及科学活动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境遇,以及学者们从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不同角度所做的反思。

“知识”是一个古老而又时新的话题。在古希腊的哲学家那里,与“意见”(doxa)不同,“知识”或“科学”(episteme)是确证了的真理,从真理出发就奠定了西方主流的知识观。这种观点认为,知识一经产生就独立于它的生产者,成为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普遍的、永恒的存在。如今,这样的想法逐渐为另一种知识观所取代,在这种观念中,首先,知识是在演化着的,无论是知识准则还是功能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如果说希腊的知识以数学(几何学)为楷模而贬斥修辞学,中世纪的知识崇尚神学而抗拒巫术(神迹),那么近代以来的知识则倡导实证而抵制形而上学。我们不可能为知识的演化设定目标,因为没有任何超验的力量或“上帝之眼”可以做到这一点。正如库恩所说的那样,我们只知道知识从哪里开始演化,却无法获悉并主宰它朝何方演化。其次,“知”与“行”始终是一体的。60 多年前,赖

尔就试图区分两类知识,“know—that”(所知)与“know—how”(能知)，“能知”不仅涉及认知能力,同时也涉及行为能力。当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时,他所谓的“知识”显然是指基于实验活动的“新科学”。在科学革命与产业革命之后,人们逐渐意识到,知识的增长不仅受认知驱动,同样也受产业(创新)驱动。

近代的科学革命无疑是一场知识观念的变革,不仅改变了知识的基本准则,也改变了知识的社会功能。通过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科学被确认为人类一切认知的典范。在一个世纪前的今天,当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向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国家推介“德先生”时,在他眼里,科学已经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唯一标杆。当时爆发的那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正如胡适所说的那样,是中国人向“赛先生”行的“见面礼”。不得不接受科学的启蒙,对于当时极其落后的中国和混沌不堪的文化状况来说,肯定是一件痛苦但是又不得不为之的事,因为知识已经与中国的国运牵扯在一起了。哲学家阿佩尔曾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困惑,“这些非欧洲文化已经并且还将不得不接受欧洲的技术工业生活方式及其科学基础,它们被迫与自身造成间距,被迫与它们的传统相疏远,其彻底程度远胜于我们。它们绝不能期望仅仅通过解释学的反思来补偿已经出现的与过去的断裂”^①。

我们这里所理解的现代科学就是在拿破仑时期成型的,在 19 世纪被移植到德国,最终形成的一种制度化的科学。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社会学家,都是以此作为“原型科学”(proto—science)来设计科学共同体的认知规范与社会(伦理)规范。从此,知识开始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并且迅速扩展到不同的地区和民族。知识之所以能够突破各种文化和传播屏障,是因为人们对知识的信任是建立在严格并且统一的制度基础上的。这也是现代知识有别于传统知识的地方。知

^① 卡尔·奥托·阿佩尔:《哲学的改造》,孙周兴、陆兴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70—71 页。

识的“客观性”源自一种严格受规范约束的知识生产方式。

不过,知识的演化并未就此打住。进入 20 世纪,尤其在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模式。一是所谓的“大科学”(big science),政府或者军方出于民族国家的核心利益,集中大规模的资金来构筑大规模的平台,强势地介入了知识的生产过程。二是“产业科学”(industrial science)的兴起,改变了“为科学而科学”的格局,科学进步的动力学也由兴趣(求知)驱动转向了“创新”驱动。由于上述研究模式多少都偏离了“原型科学”的发展轨迹,也有人称之为“后学院科学”或者“后常规科学”。

新文化运动已过去一个世纪了,这次,自上而下,中国人终于以主动的姿态迎接知识生产方式的转型。这一次同样也事关国运。当然,与一个世纪前一样,也肯定会经历磨难。在那些适应了“原型科学”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看来,新的研究模式多少颠覆了既有的规范化要求,并且与学术的失范现象,以及“功利化”“行政化”的趋向脱不了干系。再说了,这样一种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究竟能否被确认为一场知识观念的变革,以及它究竟是不是一种不可逆的演变趋势,学界还存在争议。

我们这套丛书正是以这样一种新的视角介入这场争议,并试图对知识演变的趋势做出确认。至少,下述几个方面的变化值得引起读者的注意。

首先,科学已经成为一项公共的事业,而不只是存在于少数知识精英和技术专家头脑中并且自以为是的东西。知识的有效性必须以别人的实际认可为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技专家与产业、政府人士,乃至社会公众一起共同构造了知识。当科技知识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时,这项事业就已经没有旁观者了,只有实际的参与者。这就意味着,知识的主体必定是共同主体,创新需要各方协同才能进行。也正因为如此,不同的价值与规范体系之间需要经历艰苦的协调与重塑过程。

其次,科学不再是一项纯粹的理智事业,它通过技术手段深度介入自然与社会过程,引发不可逆的后果,甚至带来生态的、社会的和伦理的风险。随着研究过程中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增大,因果性模式被相关性模式所取代,任何准确预测的努力都有可能化为泡影。更重要的是,由于涉及不同的利益,政策歧见与争议也不断延伸,尤其在一些涉及公众健康与安全、动植物保护和环境等敏感议题上导致了公众对科学的信任危机,甚至还会引发族群的分裂。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需要有一种新的治理方式和新的协同机制。在拉维兹看来,“这也意味着,科学的进步已经成为政治事件。科学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与‘科学政策’的决定如何下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至于所有的市民,他们至少都得间接地对这些决定的下达承担责任”^①。

由此可见,知识的命运不仅涉及国家的命运,知识精英的命运,甚至也关乎每个社会公众的命运。因此,不仅需要“公众理解科学”,同时也需要“科学理解公众”,只有这样方能构建起一个新的命运共同体,并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为何知识的命运就是我们自己的命运。真心希望这套丛书所选择的每一本书都有助于读者把握住自己的命运。

盛晓明

2017年11月20日

^① Ravetz, J. R.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ts Social Problem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 p. 3.

前 言

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时期被亲切地称作“德先生”与“赛先生”，代表着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在那个命运多舛的岁月，人们殷切希望它们能够救国民于水火，将中国引向自由富强的康庄大道，并承担起开民智的启蒙使命。百年之后，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前的科技、经济、政治与思想格局远远超出了前辈们的想象。历史的距离感既赋予我们不同的视域与眼光，也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必须直面的新问题。其中，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现象是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内在张力。

科学与民主关系紧张？这难道不是耸人听闻吗？根据一般看法，科学与民主分属不同的领域。前者关涉知识与真理，后者关涉权力的分配及其合法性；前者以认识世界为宗旨，后者代表着理想化的政治秩序。这是两个互不隶属的范畴，根本不存在冲突的可能。更有甚者，如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在 20 世纪 40 年代指出的那样，科学与民主之间存在强烈的亲和性，自由、平等与批判的科学精神同时亦是民主气质的展现。因此，五四知识分子将民主与科学相提并论是很有道理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启蒙与现代性的精髓。

20 世纪以来,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科学技术愈来愈多地参与公共生活。从宏观角度看,科学家与科学共同体大量介入政治事务,充当政治智囊,并实质性地影响着各种公共政策。从微观角度看,当代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周围世界”的存在方式无不带有科学技术的深刻烙印。日益专门化、精致化的专家知识与日新月异的技术产品无孔不入,不仅塑造着每个人的身份,而且左右着人们对世界的感知。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知识”在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时代表现得可谓淋漓尽致。

当科学成为一种力量(power),它与民主的关系将随之一变。科学的权威性奠基于知识合理性——远至柏拉图,近至维也纳学派,对此均深表赞同。然而,知识合理性与政治合法性是完全不同的范畴。作为政治合法化手段,民主观念自近代以来逐渐深入人心,并在 20 世纪成为广泛的政治现实。根据民主理想,任何权力的实施都应当在受众面前赢得合法性,否则将沦为霸权。如今,科学尽管已经深度参与政治生活,却一再凭借知识合理性而抵制政治合法化要求。在众多科学家及其支持者看来,科学具有最高程度的知识权威性,公众没有理由加以拒绝,除非是出于愚昧。在普罗大众看来,作为政治力量的科学不能仅凭知识合理性而逃避政治合法化要求,更别提知识合理性自身已经深陷怀疑的泥潭。结果,科学与民主之间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张力,围绕新兴科技议题引发的各种争议便是有力的佐证,例如转基因、垃圾处理、核电站等。这种形势是五四知识分子始料未及的,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如何面对?怎样缓解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张力,进而批判性地继承五四遗产?这既是一个迫切的现实议题,也是一个严肃的理论议题。与通常的科学政治学研究不同,本书不打算涉及如下主题:科技政策的演变、科学与政府的关系史、科学家的政治角色、民主的制度性安排等。我感兴趣的是,如何在认识论与存在论层面重构适当的科学观念与政治观念,从而为科学民主化开辟学理空间。

从思想史上说，流传至今的科学观念与政治观念起源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科学作为知识（episteme）被定位于理念世界，而政治则被束缚在洞穴之中。《理想国》的政治规划是用“知识”克服“意见”（doxa），用科学拯救政治，将政治合法性奠基于知识合理性。这正是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核心旨趣。如今，当科学业已介入政治生活，知识/意见的坐标系业已无法充当思想指南时，《理想国》的政治规划必须重写，指导方针是将民主作为科学之政治合法化的途径。在“理想国”破灭之后，科学不再高居理念世界之庙堂，它必须学会与“洞穴人”共处，并通过共处而重新赢得政治合法性，以免自己沦为霸权。这一规划有赖于同时重构我们的科学观念与政治观念，将认识论、存在论与政治学作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

这样做难道想解构科学、抛弃真理？绝非如此。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人们见证了太多的现代性/后现代性、合理性/相对主义的无休止争吵。本书无意卷入其中，毋宁说它的初衷是尝试寻找一条特殊的思考路线——既不同于普遍主义，也不同于解构主义。它的取向是存在论，而不是认识论。或者借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话说，它既不是现代的，也不是后现代的，而是非现代的（nonmodern）。

希望本书不仅能够关照当下之处境，亦能算作对五四启蒙运动的些许追忆。启蒙作为理念是一项“未完成的规划”，甚至注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规划”，因为启蒙者始终要承担起自我启蒙的重任，没有什么可以超越批判充当启蒙的工具，真理、科学、民主均不例外。启蒙具有什么确定的实质性内涵吗？对此，我半信半疑。启蒙让我们始终采取永恒批判的精神姿态吗？对此，我深信不疑。

目 录

导 论:科学 vs 政治	(1)
一、科学取消政治	(6)
二、古典科学与近代科学	(10)
三、书写“现代宪法”	(13)
四、通往科学民主化之路	(18)
五、内容预览	(21)
第一章 当代思想界的实践转向	(25)
一、何谓“理论”?	(26)
二、实践哲学的双重谱系	(29)
三、当代语境:海德格尔与维特根斯坦	(34)
四、实践转向诸主题	(38)
五、小结	(42)
第二章 科学实践与能动存在论	(45)
一、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	(48)
二、认识论批判与现象学存在论	(53)
三、科学实践研究与社会建构论	(58)

四、布鲁尔/拉图尔之争与“哥白尼式的反革命”	(66)
五、能动存在论与存在论的科学观念	(73)
第三章 洞穴政治还是宇宙政治?	(86)
一、洞穴政治与权利政治	(89)
二、社会契约与自然契约	(94)
三、亚里士多德与共同体政治	(100)
四、斯唐热论宇宙政治	(105)
第四章 知识、权力与政治	(113)
一、重谈福柯:权力与形而上学	(114)
二、“权力/知识”及其拓展	(121)
三、伽利略事件:现代科学的独特性	(129)
四、从宇宙政治看科学	(136)
第五章 “物”、实在性与政治学	(140)
一、“我们自己的历史存在论”	(142)
二、海德格尔与拉图尔论“物”	(146)
三、“越建构,越实在!”——论实像主义	(154)
四、物与政治	(161)
五、认识论、存在论与政治学的统一	(166)
第六章 科学的政治批判与民主化构想	(168)
一、批判、规范性与必然性	(170)
二、参与性批判——福柯论抵抗	(178)
三、以议题为导向的民主	(184)
四、科学民主化构想	(195)
五、尾声	(201)
参考文献	(204)
索引	(219)
后记	(226)

导 论：科学 vs 政治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一个出于本性而不是由于偶然而不属于某一个城邦的人，他不是一个恶人，便是一位超人。”^①亚里士多德如是说！那么，科学家属于哪一类？人，恶人，还是超人？

长久以来，求知(episteme)被誉为科学家的天职，揭露世界的真相是科学家的最高使命。为此，他们应当自觉地远离城邦(polis)，放弃污秽不堪的政治生活，冲破一切利益之枷锁，以超越者的姿态审视万事万物。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定义，科学家显然不应是“人”。他们是超人吗？对于希腊人而言，追求知识的生活是理论生活(theoretikos)，它比所有的实践(praxis)和创制(poiesis)活动都要高贵。“这是一种高于人的活动，我们不是作为人而过这种生活，而是作为在我们之中的神。”^②神或超人是天生的非政治动物：上帝是超凡脱俗的唯一者，超人则不愿委身于任何群体。然而，超人距恶人仅咫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载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77页。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载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八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1177b25—30。

尺之遥。超人一旦返回城邦,很可能变成全民公敌。因此之故,雅典人处死了苏格拉底!

超人也好,恶人也罢,科学家原则上不应归属任何城邦,真理必须与政治严格划清界限。科学反政治!——这是古希腊思想家留给后人的重要精神遗产。时至今日,它依然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以致任何将科学与政治相提并论的做法无不沦为批判的标靶。在此背景下,“科学政治学”(politics of science)这个称谓本身显得如此矛盾,如此荒唐。你怎么能对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科学作政治学考察呢?这就如同谈论“圆的方”或“方的圆”那样不可理喻。我们一再被告知,科学与政治、真理与权力、认识论与政治学是水火不容的,千万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它们混为一谈。对科学作政治学探究是不允许的,科学政治学原则上是不可能的。

有人会立即提出异议:这一论断看似有理,事实上严重违背历史。20世纪中期以来,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对科学的政治学研究或“科学政治学”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科学共同体的分层和权力结构、科学家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科学对政治决策的影响力等一系列主题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重视,相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对此,谁也不能置若罔闻。的确,科学与政治是当代思想家不容回避的课题,因为二者从未如此紧密地相互交织。一方面,科学共同体越来越受制于国家的科技政策,科学家们千方百计进行政治游说以获取更多的科研资源。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越来越依赖科技智囊团提供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否则行之有效的政策难以出台。以科学家的政治角色、科学与政府的互动为主题的科学政治学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

历史事实的确如此。逻辑与历史常常无法令人满意地统一,甚至有时是背道而驰的。在我看来,尽管现有的科学政治学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它们大部分没有或者不愿触碰科学反政治的思想传统。对此,不妨与科学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ce)对照一下。众

所周知，由罗伯特·默顿开创的科学社会学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家的社会角色、科学的精神气质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而系统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令人诧异的是，它始终对知识议题保持沉默，拒绝深入到科学的“内核”。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兴起，这一局面才有所改观。在此之前，科学社会学只是关于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的社会学，无关乎知识、真理、合理性等知识论议题。谈论科学却忽略知识，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眼下，科学政治学的处境与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有几分相似。一方面，它们热衷于讨论科学共同体与政治进程的各种互动关系；另一方面，它们却拒绝将知识、实在与政治相提并论。为什么会这样？我猜测，绝大多数的科学政治学探究不自觉地沿袭了古希腊以降的科学反政治传统。据此，科学家尽可以游走于政治舞台，乃至争当政治明星，但科学之为科学是非政治甚至反政治的。

在此背景下，我们如何构想科学与民主的关系？启蒙运动以降，凭借上帝、血统或习俗等为统治权的合法性进行辩护，这类做法遭到广泛质疑。自由、平等、个体权利等政治理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在此进程中，民主作为一种新的合法化手段引起了政治思想家的浓厚兴趣，并在 20 世纪成为广泛的政治现实。根据民主理想，我们原则上不再能够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二者具有同一性：被统治者同时是统治者，反之亦然。由此，自律与他律实现了和解，个体自由与群体秩序被有效地统一起来。然而，无论民主理念多么诱人，都与科学格格不入。根据古典观念，*episteme* 或 *scientia* 意味着普遍必然的知识和真理。既然是真理，便没有商讨的余地。它无须征得受众的普遍同意，是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必须无条件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不仅是反政治的，更是反民主的。另一方面，相比于君主制、独裁制等政体，民主确有自己的优势，它能够凭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性原则避免暴政与霸权。但是，它只能活跃于非科学、非真理的公共领域——柏拉图所说的“洞穴”。一旦接近科学，民主

必须服从“真理的专制”，多数原则或者商谈原则与真理毫无关系。

20 世纪下半叶，思想界弥漫着某种喧嚣与骚动。倘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对科学的焦虑。经过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的一连串打击，普遍性、客观性、自主性、价值中立、无私利性等优良品质遭到层层拆解，古典的科学、知识与真理形象风雨飘摇。科学曾经是启蒙思想家披荆斩棘的利器，如今却成为怀疑和嘲弄的对象。1781 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批判的时代”：一切都必须接受理性的检验，一切都必须诉诸理性的法庭。但自然科学例外，因为它已经获得了牢固的基础。^① 康德乐观地以为，“先天综合判断”或科学是否可能的问题已经由哥白尼、伽利略和牛顿作了肯定的回答。相比之下，当代人显然缺乏那股智力的勇气和信念。我们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不再是“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而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在我们这个时代，科学不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而变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即便是胡塞尔这位坚定的希腊主义者，晚年也在为克服“欧洲科学的危机”做着不懈努力。^②

思想界的焦虑并非空穴来风，而与当代科学的现实处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 17 世纪不同，当今的科学技术或“技术科学”（technoscience）早已与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相互渗透。尽管科学共同体的自主性与独立性依然是广受赞誉的理想，但也仅仅是理想罢了。科研活动所需的资金、人员和制度支持，研究成果潜在的伦理和价值风险，政府对科研方向的政策性引导，所有这一切均无法为科学家所单独掌控。另一方面，技术科学日甚一日地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存在方式和感知方式。在这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Axii。为了行文需要，某些段落参照 Smith 英译本略作修改，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参见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1929.

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年。